

# 德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因素

## ——论相得益彰的职业与学术教育

Hans-Peter Klös

(德国经济研究所, 德国 科隆 50459)

**摘要:**在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渗透性已经得到了很大提高。科技的发展、全球化和时代的变迁都使需求在发生变化,而“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培训的学术化”都是非集中式教育体系对此作出的务实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建立在一定专业化模式基础上的价值链能够得到训练有素的人才作保障。在教育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交叉混合型的过程中,就业力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有的差异化高校体系及其存续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

**关键词:**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德国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G5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045(2017)01-0073-07

## Analyzing the Successful Factors of German Economic Mode: Discussing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Hans-Peter Klös

(Cologn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ologne 50459, Germany)

**Abstract:** In Germany, the permeability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re changing in demand, while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academic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pragmatic response to a non-centralized education system. By only doing so can we ens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value chain that is supported by the mode of well-trained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the employment forc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al system. The existing differentiated university system and its survival is an important successful factor.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vocational education; German economic model

### 1 教育政策的理念

在一个经济体里,教育与资格评定体系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仍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在处理教育和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可用性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此曾经展开过方向性的讨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和就业力(Employability)

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但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就业力在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对高校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来看待,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中,就业力包含了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应用能力。具备这些能力,人们才能有针对性并自主地去适应不断变化

的框架条件,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就业或者保持就业。探讨这几个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专业人才供应息息相关。本文将揭示就业力在这几个领域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展示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直接关系。

教育政策往往追求一系列的目标,例如确保参与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受教育贫乏人群数量、提高人口整体能力水平、使更多人有接受职业教育和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等。在宏观经济层面,涉及的是确保国家的科技实力、企业有劳动力作支持,以及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实力。无论从政治上的公正原则,还是教育经济学视角出发,都可以认为,教育起点公平是连接这些不同目标的核心点。

如果没有教育起点公平,就可能会对经济发展起负面作用:一方面,这会对经济体的收入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教育越来越多地对一个经济体的收入起决定性作用。过去一些年显示,有中级学历的人多数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而有高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地生活高收入家庭。<sup>[1]</sup>综合来看,整体教育水平提高会更加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避免价值链遇到损失。<sup>[2]</sup>另外一方面,受教育机会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对经济繁荣成果如何分配以及人们是否有获得提高收入的机会:与之相应地,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如何在接受人力资源投资方面创造起点机会公平的问题。<sup>[3]</sup>有研究证明,教育水平与收入地位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在收入阶梯上,能够向上移动多少,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获取的学历,而这是很早就奠定下基础的。<sup>[4]</sup>

教育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许多教育政策层面的行为人以及在教育输入和教育输出之间的很多变量施加影响。如果在中小学里职业引导教育做得好,学生过渡到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或者到专业学校和高校学习也会变得较为容易,因此它也是实现纵向渗透和向上流动的前提。我们应当认同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和其中诸多的行为人,即国家(制定框架条件、建立职业学校)、行业协会(集中考试、授予受培训人资格证书、监管培训标准的执行等)以及企业(学习与教学地点)对实现“通过教育融入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目前在欧洲的就业危机中,“双元制”国家,即德国、瑞士、奥地利却能够在青年失业率方面交出良好的成绩,就要归功

于此。德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有国家和行业协会确保培训的高质量,受培训人获取的能力和证书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可比性,并使职业教育取得高回报。<sup>[5]</sup>

与教育学不同,教育经济学更加注重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因为这里强调投资思维的逻辑,即投资的目的是要有收益。有了这样的思维为基础,研究各项教育投资的收益也就很正当。在职业培训上进行投资,一般来说,其收益来自于使用获得的职业资格,从中的收获便是收益。同时,职业资格也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筛选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就业的机会。

总而言之,一个机会平等、有渗透性、强大的教育体系能够因其产生巨大的、有利的外部效应来帮助经济体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普遍政治目标。这样的教育体系能够帮助分配社会地位,并承担社会“拣选和筛选功能”。为了使这样的拣选功能确实是根据能力,而不是根据纯粹的精英原则发挥作用,教育起点公平和教育渗透性从经济学视角看也极为重要。因此,本文在下一部分将探讨应当怎样构建教育体系,以便尽可能节约资源力争达到取得的目标。

## 2 “德国经济模式”对人才的素质需求

德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势头良好是有一系列原因的。重新获取国际竞争力,2010 议程产生的长期效应都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良性发展。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功因素是德国的产业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相得益彰的职业培训与资格评定体系。德国与欧洲其他经济体相比,其就业率更大程度地受工业价值链影响:无论在任何领域的制造业,还是与工业间接有关,属于为工业提供前置或者后置商业服务的各个行业。

工业与商业服务业的相互交织是“德国经济模式”的核心,这在欧洲也是很特别的。<sup>[6]</sup>这种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比其它经济体更加受 MINT 专业人才(MINT 是德语 Mathematik/数学、Informatik/信息科学、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和 Technik/技术的缩写,即这四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的依赖。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MINT 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德国的经济模式还具有很强的出口导向性,并在高科技领域享有相对来说较大的优势。由于在任何生产流程都需要

高技术, MINT 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的专业知识便构成了支持这个经济模式的核心。

因此,“德国经济模式”的创新力相比之下更加受到技术人才(大多数情况下被总称为 MINT 专业人才)拥有量的制约。相对其他就业人员来说,有 MINT 高级专业人才多的企业能从事更多的研究,具有更强的创新性,最终往往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2013 年,德国将近 57% 的国民经济创新支出都落在了集中 MINT 专业人才的金属与电子产业里,而在这类产业的就业比重在整个经济体中才占不到 10%。<sup>[7]</sup>

别是对高科技产业(技术服务/研发服务、EDV/通信业、电子、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工/药品)来说,是否拥有 MINT 领域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sup>[8]</sup>为了满足德国这样一个科研与知识密集型经济体对工程师的需求,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有高效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尽管学生人数总体来说在强劲增长,但是,德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效能还是不足以满足整个经济体的需求。如果没有技术人才的移民,整个需求是无法满足的。此外,在 MINT 领域现有的瓶颈将来还会比现在更加明显地体现在职业领域。<sup>[8]</sup>

与国际上高度发达的 OECD 国家相比,德国的创新能力排名很不错。<sup>[9]</sup>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职业教育的优势,因为职业教育也对创新能力起很大作用。较新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迄今为止还未得到广泛传播的认识。根据这个研究,职业教育对培养驾驭复杂局面(特别是技术方面的)的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二元制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体系使多数就业人员,而不是仅有一小部分的高素质人员能够处理错综复杂和无法预测的情况”。<sup>[10]</sup>在工业 4.0 的大环境下,这个能力也更为重要;构建这个进程所必需的资格和相关职业领域都对能够应对复杂和多样化情形的能力有很高要求,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工作能力。很独特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从事 IT 核心职业与传统金属职业的人在工作能力指数表上都名列前茅。<sup>[11]</sup>

通过职业培训、进修和学术教育可以打造一个较为广泛的拥有技术素质的人才基础,由此推动创新力的发展。同时,这也是一个经济体驾驭错综复杂情形的前提。德国经济在国际上的错综交织复杂性相对来说很高。<sup>[12]</sup>总体来说,德国科研体系的

条件可以列入比较好的一类。例如,MIT 发现,在德国常见的是渐进型创新,而非突变型创新。这样就形成了具有优势的“产业生态系统(industrial ecosystem)”,其特征是这个体系拥有与各类产业研究中心、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以及技术代理机构建立的密布的联络网和以大学为基地的产业研究。<sup>[13]</sup>

在此背景下,鉴于德国的经济与创新模式,证实劳动力市场遇到瓶颈的研究<sup>[14]</sup>就更应当得到重视。目前,在“机电、能源、电子”和“机械与汽车制造技术”职业领域里已经出现了人才瓶颈。特别是涉及 MINT(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域,对所有层级资格(职业培训结业、进修结业、高校毕业)的人才需求都遇到了瓶颈,它们占了所有瓶颈职业的一半。大部分瓶颈职业都要求有职业培训结业证书。纵观遇到瓶颈最严重的 10 项职业,就可以证明具备职业资格的人才很缺乏,因为其中有 8 项职业要求拥有职业培训结业证书。<sup>[15]</sup>

在上述可以被称为科技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技术专业人才的供应对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机会起决定性作用。在国际化工作分工中,驾驭错综复杂性的能力是决定是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缺少(技术)人力资源最终将导致贫穷。为了确保拥有人才基础,二元制职业教育与高等学历教育应当作为两个元素相得益彰地存在。另外一方面,也由于年轻人接受教育的行为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所以这两者也不应当相互毫无关系地并存。因此,下面将要研究的是德国教育体系中这两个核心教育主体发生的结构性转变。

### 3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关系

至 2011 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第一学期人数有了明显增长,并自此一直持高不下。到目前为止,开始接受企业培训的年轻人只比开始读大学的年轻人多一点儿。(图 1)在此背景下,在德国曾经激起了一场被误认为“过度学术化”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前些年,在对拥有高学历人口比例进行国际比较时,德国还被指出缺少拥有高学历人口。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我们把需要达到的能力水平作为标准在国际上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很多在国际上被列为高等学历的能力要求甚至低于德国对职

业教育培训的要求。<sup>[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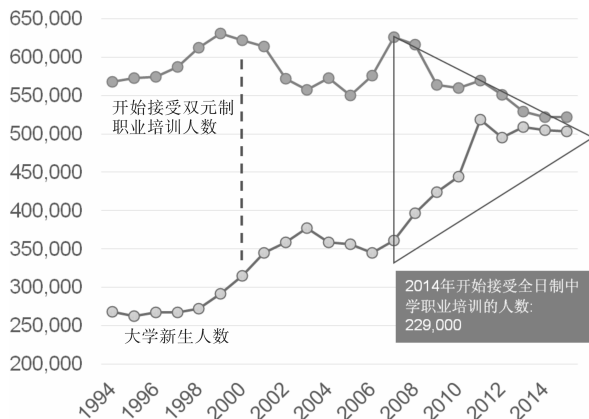


图1 1994-2015 德国大学新生人数和开始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数

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

因此,在德国资格框架里确立职业教育学历和学术学位原则上具有等值性是正确的。此外,对人们选择接受何种教育起影响作用的框架规则有了很大改变。有迹象表明,德国教育体系所谓的“支柱化”<sup>[17]</sup>(如果这种形式确实存在过的话)已经被明显去除。这是因为多方请求加大教育体系的“渗透性”,因而发生了一系列体制性的变革。在此进程中,渗透性在“取得更高资格”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双元制职业教育和第三级教育(大学教育)之间具有渗透性的新型,并被证明为有效的模式主要有三种:(1)双元制高等教育;(2)高校向已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员开放;(3)晋升进修。

**3.1 双元制高等教育** 巴登-威滕堡州的职业教育学院首先开发了这个模式。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使职业教育学历具有差异性,但又使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能够相互渗透的成功模式。双元制高等教育也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合性,并且可以充分扩展的模式。双元制专业的学生中70%都是学习工学结合一体式的专业。大部分学生都与为其提供培训的企业签有录用协议。近40%的被调查人都想在本科结束后继续学习,其中有60%的人计划在攻读硕士。他们对企业提供的学习条件满意度总体来说都很高。<sup>[18]</sup>双元制高等教育中,无论全职双元制专业还是工学结合一体式双元制专业都为实现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的过渡提供了典范模式,这种模式也反映了在企业培训市场上产生了新的供需形式,并且这是一种混合式的体系。<sup>[19]</sup>万方数据

**3.2 高校向已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员开放** 自2002年制定的KMK(德国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决议以来,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群可以让高校承认其在职业进修和晋升进修(Aufstiegsfortbildung)中取得的成绩,把这些也算为高校的学习成绩。此外,自2009年以来,获取的职业晋升进修证书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的入学资格来看待。<sup>[20]</sup>有学徒培训证书和职业实践的申请者可以通过一个资格考试取得绑定专业的高校入学资格。但是,迄今为止,如何对工作业绩进行换算,各地在实践中的操作都不尽相同。因此,通过博洛尼亚进程创造的在大学学习和职业工作之间可以灵活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利用率还很低。有职业教育学历,但是没有相应的中学毕业证书作为大学入学资格的大学新生目前只占到3.5%,因此,这个水平仍旧是很低的。<sup>[21]</sup>

**3.3 晋升进修** 领域有很大拓展潜力,特别是技术员、经济技师、技师等头衔都可以通过晋升进修获得。参加晋升进修的前提条件是双元制职业培训结业并有职业经验。2014年有近172 000人开始参加晋升进修。这也是读大学以外的另外一个选择。对有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来说,取得晋升进修证书是在职业生涯中又前进了一步,并且也会反映在收入上。在有晋升进修学历和高等学历的人群之间进行收入比较,可以发现,没有一个群体显示比另外一个群体在收入上始终享有优势。<sup>[22]</sup>

总之,现在还没到谈论“过度学术化”的地步。所有关于不同类别学历受欢迎度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劳动力市场对任何类型的专业人才都还有很大的吸收度。所以,在此衡量教育政策的标准应当是:为了实现并提高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的渗透性和互补性,是否准确找到了需要优先考虑的内容。在此不应当从高校才开始行动,而是应当在一个人教育历程的早期便开始。因此,应当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加强职业引导和MINT领域的培养来普遍提高中学和高中毕业生的基本教育水平和拥有参加职业培训资格的人数。

为了加强双元制职业教育,首先企业应当能够保障培训质量。此外要由有良好的框架条件,即与企业合作的职业学校应当具有实力,并且要向那些至今为止参与职业教育有困难的人群提供新的学习方式,以此减少没有任何职业教育学历人群的数量,而这类人群现在仍然明显还为数很

多。关于如何把工作业绩换算到学术教育的问题,应当尽快达成一个统一的做法。反过来,如何把在高校取得的学习成绩换算到职业教育上,也是需要拓展的。

## 4 就业力和高校体系

培养毕业生具有就业力应当也是高校的目标之一。虽然对就业力的概念有争议,但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在高校政策领域展开了试图对此达成共识的讨论。特别是科学委员会新近多次表态:科学委员会认为在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之间不能缺少功能性的平衡。<sup>[23]</sup>“高校学习应当使学生具备从事复杂职业工作的能力……高校在此的任务是适当兼顾学术教育的三个核心纬度,即(专业)科学教育、人格培养和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sup>[24]</sup>

因此,毕业生具备就业力应当是高校关心的大事。就业力(“Employability”或者“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这个概念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研究,对其的理解是“能够目标明确并自主地使自己的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应用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框架条件,并且能够运用这些能力以获取就业或者保持就业”<sup>[25]</sup>对能力做出的主流定义是:“个人身上可以支配,并通过它们可以学会的用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认知技能和技巧,以及与之相关的在动因、意志(作者注:涉及目的和意愿)和社会性层面上都有在发生变化的情境下成功并负责地使用解决方案的意愿和技能。”<sup>[26]</sup>

高校以就业力为导向也顺应了企业对毕业生的能力要求:<sup>[27]</sup>专业能力和应用能力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能力和沟通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个性特征。此外还涉及到在情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在此需要的是把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新问题上的能力。这种“知识转化能力”要求在专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之外还要具备诸如坦诚、承担责任的个性特征。因此,专业能力和掌握运用知识的方法固然是必要的,但还不是具备就业力的全部前提。

此外,在当前关于“工业4.0”的讨论中,可以认为,通过使用数字技术,生产与组织流程的相互连接程度将越来越深入。但是,职业世界的数字化对资格认定体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在教育过程中使用数字媒体的问题都还不能得到清楚回

答。<sup>[28]</sup>但在职业世界中预计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产生虚拟、多样化、暂时性的工作团队,以及常规工作向复杂的方案设计、分析、研发任务转变等,因此估计工作中的复杂性会增加,对能力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在数字化进程中,对员工社会能力的要求也会提高。灵活的工作组织要求员工有很积极的合作意愿、极强的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独立组织自己工作的能力和意愿。<sup>[29]</sup>

提升就业力、能力培养和人格发展应当是学术教育任务中的三个相互呼应的元素,在提升就业力和学术教育之间因此也不应当存在原则性的对立。所以,值得欣喜的是,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和许多社会合作伙伴也站出来支持高校促进培养学生具备正确理解的就业力。“这(作者注:德国理解的就业力)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并不是单为从事某项具体的工作,而是为可能出现的工作领域,包括从事自由职业做准备……很有必要在大学学习中更好地体现出对劳动力市场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有实际应用性的内容。这样做也很有意义,因为它会增添学生的学习动力,并且通常情况下也会改善学生的学习成果。”<sup>[30]</sup>

总之,掌握专业知识和方法只是就业力的一个元素而已。把掌握的知识能够用于解决新问题,这个能力特别受到企业的认同。因此,高校在进行实践导向型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应当停留于仅仅是不加思考的介绍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模式,更多的应该是把实践中的问题融合到学术教育中,同时又不能忘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但这不只是高校的任务,高校当然应当在学生的大学学习期间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以及职业领域需要的相关能力,而政策也应当提供合适的法律以及实体框架条件,使良好的大学学习成为可能,同时确保渗透性,并给高校必要的自由空间用来自主地进行特色建设。

## 5 总结

德国教育体系的效能总体来说明显比在国际比较中传达的信息更强。无论职业教育,还是高校的人才培养都越来越多的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在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渗透性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果进行系统化观察,甚至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互补性愈发增强,但这更多的是学生、学徒和他们的家长,还有企业的需求以及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

事先计划好的或者各州之间协调好的教育改革引起的。

有时被警告需要防止出现的“大学教育职业化”和“职业培训学术化”都是非集中式教育体系对科技发展、全球化和时代变迁引起的需求变化而作出的务实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建立在一定专业化模式基础上的价值链能够得到训练有素的人才为保障。在教育体系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呈现出交叉混合型的过程中,就业力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有的差异化高校体系及其存续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职业教育的继续发展——在此的关键词有职业世界的数字化、继续教育的新动力、高层次职业教育等——对确保德国教育和资格评定体系的未来来说是一个挑战。

#### 参考文献:

- [1] C. Anger, A. Orth; Bildungsgerechtigkeit in Deutschland, Köln 2016.
- [2] E. A. Hanushek, L. Wößmann;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6 (2008) No. 3, S. 607-668.
- [3] G. S. Becker; Die Bedeutung der Humanvermögensbildung in der Familie für die Zukunft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C. Leifert (Hrsg.): Demographie und Wohlstand. Neuer Stellenwert für Familien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sbaden 2003, S. 96.
- [4] F. Cunha, J. Heckman;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2007), No. 2, S. 31-47.
- [5] F. Pfeiffer, H. Stichnoth; Erträge von Bildungsinvestitionen, Mannheim 2014.
- [6] Fast alle großen industriellen Cluster Europas sind in den vier bedeutendsten Wirtschaftsbereichen des Verarbeitenden Gewerbes – Auto- und Luftfahrtindustrie, Maschinenbau und Metallbranchen, Elektroindustrie und Elektronik sowie Chemie, Pharma und Biotechnologie – in Deutschland und den angrenzenden mitteleuropäischen Regionen konzentriert. In süd- und westdeutschen Regionen befinden sich die größten europäischen Cluster in diesen wichtigen Branchen. Anders als in anderen in den vier Industriebereichen starken mitteleuropäischen Ländern gibt es nur in Deutschland Regionen, die in allen wichtigen Industrie-segmenten führende Cluster aufweisen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Cluster Trends. European Cluster Observatory Report, Brüssel 2015).
- [7] C. Anger, O. Koppel, A. Plünnecke; MINT – Frühjahrsreport 2016 – Herausforderungen der Digitalisierung, Gutachten für BDA, BDI, MINT Zukunft schaffen und Gesamtmetall, Köln 2016.
- [8] ebd.
- [9] V. Erdmann, O. Koppel, A. Plünnecke; Innovationsmonitor, Die Innovationskraft Deutschlands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Köln 2012.
- [10] S. Pfeiffer, A. Suphan; Der AV-Index. Lebendiges Arbeitsvermögen und Erfahrung als Ressourcen auf dem Weg zu Industrie 4. 0, Working Paper 2015 # 1, Universität Hohenheim 2015, S. 27 f.
- [11] S. Pfeiffer, A. Suphan; Der AV – Index. Lebendiges Arbeitsvermögen und Erfahrung als Ressourcen auf dem Weg zu Industrie 4. 0, Working Paper 2015 # 1, Universität Hohenheim 2015, S. 17 ff.
- [12] R. Hausmann, C. Hidalgo, S. Bustos, M. Coscia, S. Chung, J. Jimenez, A. Simoes, M. Yildirim;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2nd ed., Cambridge 2013.
- [13] S. Berger; Making America. From Innovation to Market, MIT Task Force on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Cambridge, Mass 2013, S. 138.
- [14]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Der Arbeitsmarkt in Deutschland. Fachkräfteengpassanalyse, Statistik/Arbeitsmarkt-berichterstattung, Juni, Nürnberg 2016.
- [15] S. Bußmann, S. Seyda; Fachkräfteengpässe in Unternehmen. Gutachten für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Berlin 2014.
- [16] C. Anger, A. Plünnecke; Signalisiert die Akademikerlücke eine Lücke bei den Hochqualifizierten? – Deutschland und die USA im Vergleich; in: IW – Trends, Jg. 36 (2009), H. 3, S. 19-31.
- [17]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Chancen erkennen – Vielfalt gestalten. Konzepte und gute Praxis für Diversität und Durchlässigkeit. Abschlussdokumentation des Projekts nexus, Konzepte für gute Praxis für Studium und Lehre, Berlin 2012.
- [18] K. Hähn, S. Krone, M. Ratermann; Dual Studieren – und dann? Ergebnisse einer bundesweiten Befragung dual Studierender, IAQ-Report 1/2016, Duisburg, Essen 2016.
- [19] Als hybride Ausbildung bezeichnet der Wissenschaftsrat Ausbildungen, die berufspraktisches und wissenschaftlich-akademisches Lernen in einer zeitlich abgestimmten Form verbinden. Das duale Studium ist eine Spezialform der hybriden Ausbildung. Hybridqualifikation sind Qualifikationen, die in einer Kombination aus beruflichen und akademischen Ausbildungen bzw. Ausbil-

- dungsbestandteilen erworben wurden. Die Doppelqualifikation stellt eine Spezialform der Hybridqualifikation dar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Gestalt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Erster Teil der Empfehlungen zur Qualifizierung von Fachkräf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Darmstadt 2014).
- [20] Der Wissenschaftsrat geht noch dar über hinaus und schlägt unter anderem vor, dass Absolventen einer Lehre künftig ohne zusätzliche Berufserfahrung und ohne Beschränkung – das heißt ohne Abitur und Fachhochschulreife – studieren dürfen. Eine Lehre würde damit der allgemeinen Hochschulreife gleichgestellt. Zudem fordert der Wissenschaftsrat, dass es flexiblere Wechselmöglichkeiten zwischen beiden Bildungsbereichen geben soll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Gestalt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Erster Teil der Empfehlungen zur Qualifizierung von Fachkräf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Darmstadt 2014, S. 13).
- [21]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Bildung in Deutschland. Ein indikatorengestützter Bericht mit einer Analyse zu Bildung und Migration, Bielefeld 2016, S. 128.
- [22] Vielmehr sind Fachrichtung, Beruf, Tätigkeitsanforderungen und Branche wichtiger für das tatsächlich realisierte Einkommen als die Art des Abschlusses. Eine Untersuchung der Lohnverteilung von beruflich Qualifizierten, Fortbildungsabsolventen und Akademikern zeigt, dass es deutliche Überschneidungen zwischen den Gruppen gibt (R. Flake, D. Werner, M. Zibrowius; Karrierefaktor berufliche Fortbildung-Einkommensperspektiven von Fortbildungsabsolventen; in: IW – Trends, Jg. 43 (2016), H. 1, S. 85-103).
- [23]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r Gestaltung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Erster Teil der Empfehlungen zur Qualifizierung von Fachkräf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Darmstadt 2014, S. 7.
- [24] Wissenschaftsrat: Empfehl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Hochschulbildung und Arbeitsmarkt. Zweiter Teil der Empfehlungen zur Qualifizierung von Fachkräf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Darmstadt 2015, S. 39.
- [25] J. Rump, S. Eilers: Managing Employability, in: J. Rump, T. Sattelberger, H. Fischer (Hrsg.): Employability Management – Grundlagen, Konzepte, Perspektiven, Wiesbaden 2006, S. 13-73.
- [26] F. E. Weinert: Leistungsmessungen in Schulen, Weinheim, Basel 2001, S. 27 f.
- [27] DIHK: Kompetent und praxisnah – Erwartungen der Wirtschaft an Hochschulabsolventen Ergebnisse einer DIHK Online-Unternehmensbefragung, Berlin 2015; C. Konegen-Grenier, B. Placke, A.-K. Schröder-Kralemann; Karrierewege für Bachelorabsolventen, Essen, Köln 2015.
- [28] Deutscher Bundestag: Endbericht zum TA – Projekt “Digitale Medien in der Bildung”, Büro für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beim Deutschen Bundestag (TAB), Ausschuss für Bildung, Forschung und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Ausschussdruck-sache 18/213a, Berlin 2016.
- [29] A. Hammermann, O. Stettes: Beschäftigungseffekte der Digitalisierung – Erste Eindrücke aus dem IW – Personalpanel; in: IW – Trends, Jg. 42 (2015), H. 3, S. 77-94.
- [30] BDA, DGB, HRK: Beschäftigungsfähigkeit von Hochschulabsolventinnen und –absolventen weiter verbessern! Gemeinsame Erklärung, Juli 2016, Berlin 2016.

(翻译:陈颖<sup>①</sup>)

[责任编辑:文竹]

<sup>①</sup>陈颖(Ass. jur. Ying Lackner), y.lackner@hs-osnabrueck.de, 德国法学硕士、持德国司法职业资格、德国法院中德文宣誓公证翻译、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汉语教师, 从事中德商业及项目咨询、项目管理、中德文翻译(尤其是法律、经济与教育领域)、汉语教学等工作, 现居德国。